

黎明组长知道“罗炳乾”

侦察员们决定围绕罗炳乾仔细排查。罗炳乾的住址福佑路是南市的一条小马路，外线监控条件差，但侦察人员仍不放过一个疑点，风里雨里白天黑夜全天候跟踪监控。然而“跑街”不跑，仍没有发现罗炳乾踪迹。

正当侦察人员为破案焦急不安时，我方秘密电台突然收到台湾“保密局”总台发给吴思源的一份密电，命令吴思源报告飞机轰炸效果，并通知发给活动经费20两黄金。

我方秘密电台立即按敌方规定去报查询：吴思源是何人？

总台答复：“错发。原电撤销。”敌方的这一差错，对我方是个重要发现，直接证实了吴思源确是一个向台湾当局提供轰炸目标，报告轰炸结果的潜伏电台。

根据这一重要信息，扬帆当机立断，决定由技术研究组配合吴思源案的侦察工作。

当侦察科的同志谈到振记瓷器店有个“跑街”叫罗炳乾时，技术组长黎明不觉一怔。

他让侦察科的同志再讲一遍，并重复了一遍：“罗炳乾？”随即向侦察员介绍说：“国民党军统有个报务员也叫罗炳乾，原名罗德阳，又名罗汉，1918年生，湖南华容人，1937年考入特务组织办的技校干部训练班，毕业后在军统重庆总台和郑州站任报务员，抗战胜利后在‘国防部二厅’侦测部台技术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。罗的技术娴熟，是个干练的特工，解放后去向不明。”

侦察组长黎明，原名厉培明，他是由表兄、中共党员武振平策反过来的起义人员，起义前是国民党“保密局”杭州支台中校台长，对

“二六”大轰炸中的秘密战(下)

◆ 姚华飞



▲ 罗炳乾
◀ 罗炳乾的自白书
▶ 罗炳乾（捉东西者）在振记瓷器店门前

“军统”的电讯人员情况比较熟悉。依据黎明介绍的情况，侦察员们对案情作了进一步分析。“军统”特工罗炳乾与振记瓷器店跑街罗炳乾，姓名、年龄相符，只有籍贯不同。跑街罗炳乾户籍记载是南京人，但他的妻子施丽华是湖南人，很可能罗的籍贯是假的。经研究决定，对罗炳乾进行技术侦察。

“吴思源”就是罗炳乾

测向工作在紧张地进行中。经实地查看，光复西路上振记瓷器店地处市区近郊。这里人员往来较多，白天车辆往来较杂，晚上显得冷静清静，是隐藏架设电台较理想的地点。黎明、唐连勋等侦察组同志以瓷器店为目标，全天候地日夜测向、监控监听。然而，一连数天都没有发现可疑电波，也没有看到罗炳乾露面。于是，黎明让侦察员

把侦测器绑在竹竿上，到福佑路街头进行穿插侦测。他们还以罗炳乾福佑路362号住地为重点，在附近50米处校场路口，用车辆架台侦测。

一天晚上8时许，黎明操作的测向机突然接收到清晰的发报声，指针的方向与罗炳乾住地相符，可以肯定电台在50米到80米范围内，但还不能确定电台的具体地点。

于是，唐连勋、陈冲等侦察人员迅速下车，用手提筒易测向机顺着指针方向搜索，最后证实发报讯号来自福佑路362号，在罗炳乾居住的这间简易房子内。

同时，查明这个电台正在向台湾“保密局”总台通报。至此，紧张艰苦的侦察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“吴思源”就是罗炳乾的化名，电台所在地也已锁定。由于敌人对上海随时会进行空

袭，“吴思源”电台案不能按常规去建立内线、弄清全案了。为了尽快铲除敌人空袭上海的秘密电台，市委、市政府根据扬帆的汇报，果断决定：立即破案。

1月25日晚上，扬帆召集紧急会议，传达了市领导的指示，经过讨论，迅速制定了行动方案：1月26日乘罗炳乾外出时密捕，突击审问，弄清全案；如26日罗不出门，不能达到逮捕的目的，则于27日由钱明带领行动人员上门逮捕，再追捕其他案犯，一网打尽。

1月26日，侦察人员集中力量对福佑路罗炳乾住地和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进行24小时日夜监视，均没有发现罗炳乾出入。27日上午按第二方案行动。黎明率领侦察员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罗炳乾住所。罗正躲藏在阁楼上戴着耳机发报，人赃俱获，罗犯束手就擒。当场缴获收发报机各3部，密码本1册，发报报底和收报记录等19份罪证。在罗的抽屉中，还搜查到1张记着江南造船厂地址的纸条。同一天中午逮捕了施家瑞。1月31日又将施肖莲抓捕归案。

罗炳乾被判处死刑

罗炳乾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供认：1938年在“军统”特工人员训练班毕业后，长期在“军统局”“保密局”担任报务员、译电员。1949年7月，从广州去了台湾。他这次潜伏到上海，的确是由国民党保密局四处处长杨震裔派遣的。之后，罗炳乾就化装成商人

模样，领得CMS收发报机1部及波长、呼号、密码和经费银元5000枚，化名“吴思源”，独立行动，不与“保密局”在上海的任何人联系。1949年8月9日从台北至定海，再乘渔船于8月25日抵达上海，先住施肖莲家，与女友、施肖莲的女儿施丽华同居，后用经费在福佑路租了住房，9月12日匆匆与施丽华结婚。9月23日架台，9月24日与台湾试通成功，谎报经费用尽，要求再发掩护费黄金30两，并酌发生活费。11月5日收到由港汇来经费775万元，交其内兄施家瑞开设“振记窑号”作掩护。他还供称：先后向台湾“保密局”密报了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等情报20多件，大都是上海重要工厂复工生产情况，为国民党飞机提供轰炸目标，并密报轰炸效果。

罗炳乾的情报，不仅使江南造船厂、杨树浦发电厂等一批工厂企业及周围地区多次遭到敌机轰炸，造成巨大损失，而且造成更加严重破坏的“二六”轰炸目标，也是罗炳乾事前向台湾密报的。

为了有力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，严厉惩治罪大恶极的国民党间谍、特工，在“二六”轰炸的第二天，即2月7日，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判处罗炳乾死刑，立即执行。2月8日，《解放日报》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《密报匪机轰炸目标，匪特罗炳乾昨枪决》的详细报道。嗣后，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对涉案的施家瑞、施肖莲也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0年。

“吴思源”电台的破获，是上海隐蔽战线配合反轰炸斗争的一个成功案例，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立了大功。（摘自《上海滩》2017年第2期）

上海方城

余之



29.藏了三十多年的一个秘密

期待着柳梅男朋友的到来，成了“皇宫”大屋里的一件大事。最忙碌的要算是秀姑，她整天在院子里打扫卫生，整理花坛，剪裁花草，梅香对她说：“秀姑，依勿要太辛苦，累坏了身体勿值得。”秀姑笑呵呵地说：“喜日子啊，要清清爽爽咯，”秀姑贴近梅香的耳朵悄悄地问道：“柳梅男朋友啥辰光来呀？”什么时候来，梅香也还没有得到音讯，她只得是含糊地应道：“大概快了，快了。”曼丽遇着梅香也总不忘问一句：“有消息吗？柳梅男朋友来信了吗？”梅香摇摇头。直到有一天，柳梅与唐教授接到了小伙子们的来信，说是月底来上海。柳叶与梅香掐指一算，到月底还有两个星期。

梅香打电话给柳梅，说是要有点什么准备，比如要留吃饭吗？小伙子爱吃什么？还要买点什么上海特产让小伙子带到香港去让他孝敬父母……之类。柳梅却回话说：这要什么准备的，见见面，认识一下就行。要说准备什么她也说不上来，柳梅也仅与他有过三天的短暂接触，三天里的接触交往的确如唐教授对小伙子所品评的，对他的印象不错，也谈得很投机，但他爱吃什么，有什么习惯，她真的一时还说不上来。

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，到了月底，又过了下一个月的头一周，小伙子仍没有来。近月底时，柳梅突然接到了小伙子打来的电话，又接到了信，因家里有急事他需要返香港一次，此次来沪行程的改变万万请柳梅和她的父母的谅解。香港家里有什么急事呢？小伙子在信中告诉了柳梅：他母亲胸部的阴影扩散了，连日咳嗽不至，病情日益加重，要转送到美国去医治。柳梅在电话中对小伙子说，医治母亲的病重要，不必急于来上海，等他安排好母亲的事后再趁空档来沪不迟。

话说小伙子回到了香港，见着病情急速加重的母亲，想到母亲辛辛苦苦养育了自己三十多年，如今骨瘦如柴病怏怏地躺在床上，一阵心酸，眼泪溢出了眼眶。母亲知道他这几天

正是儿子要去上海会女友的父母，便责备他不该回来。母亲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儿子呀，你已经三十出头了，岁数不小了，个人的事重要，你怎么不去上海来香港呢？我身边还有你父亲……”儿子说：“去上海会女友的父母推迟几天没关系，治好你的病比我个人的事重要。”母亲说：“如果我的身体如同以前那么好，我若能陪你一起去上海会你的女友和她的父母该有多好。我是很想念上海的。”儿子说：“妈咪，你好好好的养病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一定陪你去上海。”母亲摇了摇头：“不可能了，不可能了，妈咪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了。”儿子安慰母亲说：“妈咪，你一定要安心下来，病会好起来的。”

临赴美国前，母亲拉住儿子的手，流着泪告诉儿子自己藏了三十多年的一个秘密：“儿子，妈咪这一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活着回来，妈咪要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件事妈咪是不能带进棺材里去的，不告诉你，妈咪要受到菩萨惩罚的，你在上海还有一个妈咪，这个妈咪是你的生母！你要答应我，你到上海之后一定要找到你的亲妈。”儿子听了母亲的这番话，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摇着头说：“妈咪，这怎么可能？你大概生病脑子糊涂了吧？”母亲坚持说：“这是真的，你答应我，一定要找到你的生母，这是我欠你妈咪的，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前，我把你交给你妈咪，我的眼睛也会闭了。”

母亲的一席话无疑对儿子是晴天霹雳，但他来不及想得那么多，听着母亲那真切的语调，专注的神情，他又没有理由否定，他向母亲点点头，双手紧紧地拉住母亲的手，两人的泪水滴在两人紧握的手背上……母亲瘦弱而干枯的手，抚摸着儿子的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我这一辈子，一定是看不到孙子了。”望着母亲无神的目光，儿子心如刀绞，他静静地坐在母亲身边，轻轻地拍着母亲的手背，心里唯有感叹：人生无常，悲喜轮回，全不由己！几天之后，母亲由父亲陪同飞往美国治病，儿子在安排好母亲的治疗事宜后，才决定飞赴上海。

飞机在万米高空之上飞行，山峦层层叠障的白云像是翻着无垠白沫的大海，小伙子望着舷窗外，心里并不平静，虽说是去上海相亲，应该是喜事，却又遇着母亲病重，真是悲喜交集，现在又从妈咪的嘴里多出来一个上海妈咪，不知是因为什么，他的内心始终忐忑不安，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

6.消灭“四害”

又过了一年，严格来说，那是1957年的秋天，我终于走进了学校的课堂，正规的校名叫作“杨浦区第二工人联合子弟小学”，简称“二联小学”——这个小学迄今犹在，先后与杨家浜小学、三联小学合并，连校址也搬了家挪了窝。其实，前一年我就去报过名，回答说我是大月份出生的（也即8月31日之后），年龄不到，要晚一年才可以入学。后来又去了民办的杨家浜小学，不料民办的与公办的一样顶真一样严格，一律“拒签”，只好老老实实地在家里又呆了一年。不过或许也有好处，如果我早一年上学的话，那就可能成了六八届高中生，“文革”中毕业分配时是“一片红”“四个面向”成了一个面向：统统上山下乡炼红心！

“二联小学”坐落在永吉路上，一边是控江东三村，一边是控江西三村。它是由杨树浦发电厂、上海自来水厂、上海锅炉厂及国棉十七厂、国棉十二厂等几家厂子共同出资联合为这个工人新村建造的。据说，老师们大都喜欢教西三村的学生，发电厂的孩子，家庭经济条件好。

那个年代的小学生活还是蛮活跃蛮有时代特色的，深深印刻在童年记忆底版上的事情有三：一是消灭“四害”，二是大跃进赛诗会，三是大办公共食堂。

说是说开展消灭蚊子苍蝇老鼠麻雀“四害”的爱国卫生运动，其实最闹猛的是消灭麻雀。凡经历过那阵势的，一提起来，到今天还会津津乐道。大人们成群结队在前面敲锣打鼓放鞭炮，仿佛是大过年一般，不不，比过年过节气势多了热闹多了。我们这些小学生就跟在后面起哄呐喊助威，一时间，锣鼓点儿把整个工人新村都敲打得沸腾了起来。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楼宇与楼宇之间穿行，锣鼓喧天，鞭炮动地，果然将小小麻雀吓得屁滚尿流不成军，自有那被吓晕了吓傻了，一只又一只从屋顶上电线杆上甚至天空中一个倒栽葱跌下地来，让我们这些小囡冲上前去逮了个正着。印象中最活跃者莫过于前文提及的“娘舅”了，他原本便是属于猴子屁股坐不牢的那一族，趁此大好时机自是过足了放鞭炮的瘾，

你看他随手抓了一大把“高升”塞在衣兜里裤袋中，走不上几步，便将香烟屁股凑近“高升”上的引信，一阵“嗤嗤”火花过后，便“乒——啪”地在半空中炸开了！那时候，“娘舅”自是八面威风，风头出足！可惜，老鬼（念：居）也有失群的黑光，不知怎么回事，突然“乒”地一响，那“高升”莫名其妙成了“低升”，竟然一头扎到地上去了，“啪”地在众人脚下炸开了！正惊魂未定之时，他紧接着又来了一记“低升”，更恐怖的是这炮仗居然在大家的脚下乱窜了一气之后才炸响！便有人大叫了起来，要开除他放炮仗的资格。幸好，没有“事不过三”，后来他手里的炮仗全都很争气，很高高在上地蹦上了天空爆炸。这是我历经五十余年的时光流逝以后，犹自难以忘怀的一幕。

当然，将麻雀列入“四害”的阵营是一桩很说不过去的冤假错案，好在不久便获得了平反，取而代之的是“臭虫”。上点年纪的人应该记得，那年头的“臭虫”还是很嚣张的，个子小小的，仅四分之一指甲盖大小，颜色为黑红黑红的，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从床铺下面枕头中间席子缝里钻将出来，朝着人们的肉头厚实之处诸如额头大腿手臂咬上一口，恶狠狠地吮吸你的鲜血，尔后奇痒无比，让你再也无法入眠无法睡你的大头觉。即便被你发觉了掐死了，当场报复性很强地放出一股浓郁的臭气，臭你一把没商量！是为名副其实臭的臭虫也。

记得那时每到礼拜天（彼时尚未实行双休日制），父亲总是将床上铺板卸下，尔后用毛笔蘸着666粉扑杀床板上的臭虫。若是发觉了那一粒粒白白黄黄的臭虫幼子，便点上蜡烛用火燎烤，于是床板上常常被熏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焦黑。偶一抬头，瞥见左邻右舍家家户户都在上演这种讨伐臭虫的节目，可谓工人新村的奇特一景。

大战臭虫的故事持续了好几年。终于，曾经不可一世的“臭虫”走到了历史尽头，淹没在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，永久地退出了与人类共存的舞台。“四害”的排名榜如同今日电脑屏幕一样重又“刷新”一遍，改成了：苍蝇、蚊子、老鼠、蟑螂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工人新村

管新生

